

哲学辨思录

● 姜正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辨思录Ⅰ

● 姜正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辨思录/姜正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5004-7108-0

I. 哲… II. 姜…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1784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特邀编辑 王建军

责任校对 肖 寒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175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思故我在。

——笛卡儿

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康德

那隐藏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

——黑格尔

目 录

第一章 宏观哲学辨思	(1)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自然科学基础 的再探讨	(1)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曲折性探微	(11)
三 简析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物质概念	(31)
第二章 认识哲学辨思	(49)
一 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的不是科学 实验而是科学实践	(49)
二 浅析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实验思想	(65)
三 生活和服务应当属于实践的基本形式	(73)
四 对人类认识起决定作用的是科学实践而 非生产实践	(85)
五 创造性实践浅析	(94)
六 朦胧认识初析	(106)

第三章 历史哲学辨思	(122)
一 社会存在第一性、社会意识第二性，并非 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122)
二 人与自然关系的进化	(137)
三 关于传统生产力观念的质疑与修正	(162)
四 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体系中的地位的 再探讨	(174)
五 谁是“第一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力”的主体?	(188)
第四章 道德哲学辨思	(196)
一 论人对需要的选择及其意义	(196)
二 社会价值是个人价值的基础	(209)
三 论诚信与利益的内在联系	(221)
四 论政治信用及其社会作用	(244)
五 诚信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	(259)
后 记	(269)

第一章

宏观哲学辨思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 自然科学基础的再探讨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自然科学基础问题，是 20 世纪 80 年代哲学界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笔者当时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并以 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自然科学基础的首创性观点，使此后的哲学教科书将“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基础”的观点改为“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在其后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笔者一直在继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思考，现将这种思考的结果表述于下，和同仁切磋。

首先，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基础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时间问题

密切相关。如果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三大发现分别问世于 19 世纪 30—50 年代，后者各项对前者发生作用的时间一定是早晚不等的，故把三大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两个等级上分别评价，似乎言之有理，能够成立。但是我们认为，关于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业已基本解决的问题。他们的有关论述，已经为我们今天再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的依据和准则。因此，不管人们今天关于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用的观点如何，它们要使自身成立，就必须做到：符合而不是违背马、恩的有关论述。“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的观点是否做到这一点了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

第一，根据马、恩的论述，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作用的时间是相同的。细胞学说虽然于 19 世纪 30 年代就已问世，但马、恩最早谈及它的时间却是 19 世纪 50 年代。1858 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指出：“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一切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最后直到‘观念’这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那么这“许多从哲学观点来看非常重要的东西”，是恩格斯何时的研究结果呢？恩格斯自己在 1858 年的那封信中说：“我是在 1857 年写的。”

己明确回答说：“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① 可见，恩格斯这一最早对细胞学说进行哲学评价的时间，即是马、恩最早研究细胞学说或细胞学说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作用的时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虽然问世于 19 世纪 40 年代，但马、恩对它的哲学评价最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1858 年，恩格斯在第一次评价细胞学说的同时指出：使黑格尔感到很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现在有个英国人已经证明：这些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这样一来，荒谬的潜热论就被推翻了。然而，这难道不是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② 在这段论述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地直接地告诉我们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作用的时间，但却通过“现在有个英国人已经证明”的内容，间接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据国内外一致意见，那个“英国人”就是焦耳；而他“已经证明”的各种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这一内容，就是焦耳的完善的热功当量理论。焦耳关于热功当量思想的最初表述虽然在 1843 年之前，但由于他当时的实验基础还较薄弱，理论本身并不完善，加之与当时科学界守旧思想的抵触，其观点不仅不为一般世人所知，就是在英国学术团体内部，也一直受到冷遇。在此情况下，焦耳只得用越来越准确的实验来打开令世人公认的道路。直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4 页。

② 同上书，第 324—325 页。

1850年前后，焦耳才以雄厚的实验为基础，揭示出自然界各种力之间“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这一规律，建立了完善的热功当量理论。此后，他的理论才被科学界接受，成果才被陆续介绍到专门学术团体以外的社会上去。显然，恩格斯这里评价所及，就是而且只能是焦耳1850年确立的完善的热功当量理论。既然如此，那么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作用的时间，当然也只能是19世纪50年代。至于达尔文进化论，它虽然晚于1859年才问世，但它刚一问世，恩格斯就马上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很快评价了它的哲学意义。由此可见，三大发现虽然没有同时问世，但是它们最早作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间却相同，即都是19世纪50年代，都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时间——19世纪40年代之后。所以“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的观点以三大发现没有同时作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据，去不同等评价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显然违背了马、恩上述思想。

第二，根据马、恩的论述，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是同等的。马、恩对三大发现的哲学评价，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的特点各不相同。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恩对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都侧重于分别单独评价，内容也不尽相同。对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较多地强调了它们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打击、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和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证明等哲学作用；对达尔文进化论，则较多

地强调了它对唯心主义目的论的决定性打击、对自然界历史发展过程的大规模证明以及对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某些观点的支持等哲学作用。这些评价尽管有所不同，但一致之处在于，它们都不是把三大发现当作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意义上的评价。19 世纪七八十年代，马、恩对三大发现往往是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综合评价的。在《自然辩证法》中，它们同属形而上学自然观灭亡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完备”的自然科学重大进步之一，在《反杜林论》中，它们同属使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构成”和“确立”的自然科学最新成就之一；在《费尔巴哈论》及其有关部分中，它们则由于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更牢固基础上的“建立”起到同等重大的作用，被一起誉为“三大发现”。在这些评价中，恩格斯也从未有把三大发现的任一项说成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的基础的意思。总之，马、恩对三大发现几十年里的评价都是一致的，都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意义上评价三大发现的哲学作用的。“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两级意义上对不同等评价三大发现，显然违背了马、恩的一贯论述。

第三，根据恩格斯的论述，“三大发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科学概念。大家知道，把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概括为“三大发现”这一科学概念，是恩格斯的一大科学功勋。可是，在自然科学优秀成果到

处都在不断涌现的 19 世纪，恩格斯为什么没有把其他科学发现而单单把上述三者概括为“三大发现”呢？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它们重大的科学意义，而在于它们作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整体性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恰恰是马、恩经过对自然科学几十年潜心研究之后才发现的。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恩初步研究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进化论，但由于他们此时尚处于对自然科学的“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阶段，^① 还不能把三大发现放到整个科学与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还没有全面和准确地揭示它们的科学地位、哲学意义和内在联系。三大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还和 19 世纪其他科学发现混同一类。19 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进入对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阶段，他们既考虑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科学和哲学发展史，又着重考察了 18—19 世纪科学发展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初步发现了三大发现在揭示自然界辩证发展过程中的较为重大的哲学意义，从而把它们从一般的科学发展中提升出来。但由于这个时期的马、恩对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正处在进行过程之中，故对三大发现各方面的认识还欠成熟，因而他们仍把三大发现与康德星云说、赖尔地质理论、道尔顿原子论、维勒人工合成有机物等多项科学发现同等看待。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1 页。

格斯进入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总结阶段。此时，他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反复比较了 19 世纪自然科学成果的各自作用，才最终把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科学地位上，揭示了它们客观的内在联系，指出其特殊重要的哲学意义。他说，在自然科学的一切重大成果中，“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①，“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在人类科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三大发现”这一科学概念。由此可见，“三大发现”概念本身，既反映了它各个内容对马、恩的关于“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的作用同等重大，又反映了经典作家的精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三大发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科学概念。因此，如果我们今天把三大发现的某两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把某一项说成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自然科学成就，这就势必割裂了“三大发现”并使其不复存在，从而完全抹杀了恩格斯的一大科学功勋。这显然从根本上背离了恩格斯的本来意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1 页。

② 同上书，第 241—242 页。

正是由于上述三点原因，我们认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两级意义上分别评价三大发现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才算符合马、恩的论述呢？这就首先要看马、恩是怎样论述这一问题的了。马、恩几十年中关于三大发现的自己哲学作用的论述实属不少，但它们基本上分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一部分评价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发展而言的。如1860年12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最近一个月——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①此后不久，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又写道：“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②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③大家知道，马、恩自己多次讲过，他们的哲学的核心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产生，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0—131页。

^② 同上书，第5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

么，他们上述的达尔文进化论，包括三大发现在内等现代科学材料对自己哲学的“基础”、“根据”和“证明”的作用，无疑只能理解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体系形成过程的自然科学基础。

第二，一部分评价是相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而言的。大家知道，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在于揭示自然界辩证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正如确立揭示社会发展一般过程和规律的历史观需要一定的社会科学基础一样，马、恩认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① 正是由于这一条件的限制，马、恩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之时，^② 并没有“确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一任务是恩格斯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对自然科学许多重大成果，特别是对三大发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之后完成的。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才集中地明确地阐明了三大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确立的作用。在《自然辩证法》中，他说：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及其他重大科学发现，在旧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了一个个缺口，“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1 页。

② 同上。

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在《反杜林论》中，他说：“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其中包括三大发现——引者注），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② 这就必然导致和一切形而上学自然观相反的、“本质上辩证的”自然观的建立“实现”自然观的伟大“变革”。在《反杜林论》二版序言中，他说：以三大发现为主要内容的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足以证明：一切“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被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③ 在《费尔巴哈论》的有关部分中，他说：19世纪50年代前后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使“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又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认识体系。……这样，比起前一世纪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现在是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了”。^④ 把恩格斯上面论述的中心加以概括，即：三大发现是辩证唯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454页。

^② 同上书，第65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④ 同上书，第525—527页。

主义自然观确立的自然科学基础。

把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我们无疑可以确立以下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内的庞大体系，其总体的形成时间是19世纪中叶（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而其中又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形成在前，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在后的情况（这一点笔者拟在其他文章中单独论述），而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如太阳星云说、地质渐变论、由无机物合成有机物试验的成功、元素周期律、电磁学说等），无疑就是这个于19世纪中叶产生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自然科学基础。从三大发现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自然科学基础到三大发现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自然科学基础再到三大发现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自然科学基础，我们的思想似乎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起点，但这正是一个典型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表面的复归、循环中包含着明显的思想发展，表明这一点，正是笔者在二十多年后重拾这一课题，写作此书的主要意旨。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 过程的曲折性探微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时间，学界一直颇有争议。然而争议各方似乎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特